

摘 要

本計劃案是擬以越窯青瓷上所見對蝶紋為線索，來考察澎湖群島發現的浙江省越窯系青瓷同類標本的時代。

由於以往學界大多未能獲知台灣海峽打撈上岸之越窯青瓷的具體面貌，同時過去對於澎湖發現的越窯系青瓷的定年方案，也頗有可商榷之處。因此本計劃案是擬針對臺灣發現的越窯青瓷作品進行編年和產地的確認。

關鍵詞：澎湖、越窯、青瓷

Abstract

This project tends to examine the “Yüeh” greenwares of Zhejiang discovered in the area of Peng-hu Islands. Former scholars have not identified the forms and the patterns of these groups of greenwares thoroughly. It remains quite ambiguous toward the time-estimation of the greenwares found in Peng-hu Islands. The project would like to determine the time and the origin of these two groups of the green wares.

Keywords : Peng-hu Islands, Yüeh, Greenwares

越窯青瓷「對蝶紋」及其有關問題

謝明良

浙江越窯系青瓷當中，經常可以見到一種以細線陰刻呈俯視展翅狀且頭部相向的所謂對蝶紋。這類紋飾一般都裝飾在底部寬坦的碟盤的內面，除了餘姚上林湖窯區（今屬慈溪市）之外¹（圖一之1、2），於鄞縣²（圖六之1、3）、紹興³（圖六之2、4）、臨海許市⁴（圖四之3）等越窯系窯址中都有發現。雖然，各窯蝶紋劃法繁簡不一，蝶翅或鬚的造型亦有差別，但雙蝶的排列構思則頗為一致，可說是在某一時段流行的業已定型的圖紋（圖一～一一）。歷來對於越窯青瓷的包括對蝶紋在內的細線劃花之年代，見解分歧，有唐至五代說⁵、五代說⁶、五代至北宋說⁷和北宋說⁸等幾種不同的看法。由於事關越窯細線劃花裝飾的編年問題，有必要略予考察。

一、越窯「對蝶紋」的年代問題

除了越窯青瓷之外，六十年代發掘河北定縣靜志寺塔基時也出土了兩件以類似技法陰刻對蝶母題的定窯白瓷（圖八、九）。⁹ 其中一件五花口圈足盤外底釉上陰刻「官」字款，另一件六花口平底盤也於露胎的外底有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等紀年墨書。上述兩件作品均為正燒燒成，說明其應該是在北宋中晚期定窯支圈覆燒技法流行之前的作品；共伴出土的其他定窯器之造型或裝飾亦具十世紀後半特徵，故一般都相信塔基出土的包括對蝶紋盤在內的定窯作品，其年代極可能就是在墨書所記的太平興國二年或之前不久。眾所周知，五代時期的越窯是吳越國錢氏轄下的重要產業，宋太祖篡周立國於建隆元年（960年），但吳越國卻要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五月，忠懿王錢俶進獻其領地降宋才覆亡。因此，設若越窯對蝶紋與定窯同類母題作品均燒造於太平興國二年，那麼其時越窯仍歸五代吳越錢氏統轄，屬於五代十國吳越時期作品。

另一方面，內蒙遼開泰七年（1018年）陳國公主墓則出土了飾對蝶紋的六花口盤（圖一〇之1）以及一件底刻「官」字款的纏枝花卉盤等越窯青瓷作品。¹⁰ 從目前的資料看

¹ 金祖明，〈浙江餘姚青瓷窯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頁116圖7之3、4。

² 李輝柄，〈調查浙江鄞縣窯址的收穫〉，《文物》1973年5期，頁32圖5之4、5。

³ 紹興市文管會，〈紹興上灶官山越窯調查〉，《文物》1981年10期，頁44圖5之1。

⁴ 湯蘇嬰，〈臨海許市窯產品及相關問題〉，《東方博物》2（1998），頁108圖二之1。

⁵ 長谷部樂爾《十世紀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紀要》3（1967），頁37圖版3。

⁶ 陳萬里，《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頁34-36。

⁷ 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頁6。

⁸ 朱伯謙，《越窯》中國陶瓷全集4（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1），頁178。

⁹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頁39-51。

¹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56圖33之1。

來，「官」款瓷器的沿續時代頗長，既有早自唐末十世紀初期的作品，晚迄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紀年墓葬中仍可見到¹¹，故難以據此做為作品定年的絕對依據，而這就提供主張越窯青瓷細線劃花是屬於五代時期作品的學者一些論述的空間。他們認為：陳國公主雖埋葬於遼開泰七年（北宋天禧二年），但同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卻是一度流傳後才陪葬入壙的傳世品¹²。然而，此一臆測並無任何論證依據。

其實，早在五十年代發掘遼寧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嵩德宮銅銚墓）時，已曾見到報告者推測是「汝窯青瓷」的細線刻劃花碟。¹³ 作品滿釉，圈足壁薄略往外卷，足內部有五處長條形墊燒痕，碟面刻畫龜荷紋。我認為：其無論在造型、裝燒技法、刻劃花風格或紋飾母題等各個方面，均與越窯窯址所出作品一致，無疑是來自南方越窯的製品。報告者李文信曾就義縣清河門墓群之二號墓蕭相公墓誌所載：「次曰慎微，崇德宮副部署」誌文，結合該墓墓主蕭相公卒葬於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推定伴出之帶崇德宮銘文的四號墓年代應約在十一世紀¹⁴。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有越窯龜荷紋碟的四號墓另件出有遼窯白瓷長頸瓶，而前述遼開泰七年（1018年）陳國公主墓也出土了造型特徵完全一致的同類長瓶。¹⁵ 這既說明了義縣清河門四號墓之相對年代確是在十一世紀前期，同時也提示了該墓和陳國公主墓所出風格近似的細線劃花越窯青瓷可能即燒造於該一時期，否則很難想像兩墓會不約而同地在同一時段以越窯的傳世品陪葬。如果以上推測無誤，那麼參照太平興國三年（977年）紀年墨書定窯雙碟紋盤資料，似可初步推定越窯青瓷雙蝶紋約燒造於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初的北宋早期。

二、 關於「太平戊寅」銘細線劃花青瓷的問題點

如前所述，其相對年代在十一世紀初期的遼寧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出土有細線刻劃龜荷紋飾的越窯青瓷碟。這類所謂的龜荷紋，於浙江餘姚上林湖黃鱗山¹⁶、紹興上灶官山等越窯系窯址中都會發現。¹⁷ 儘管從以往窯址調查報告書看來，裝飾有包括龜荷紋在內的細線劃花青瓷標本，均未帶紀年款識，然而馮先銘卻曾提到上林湖窯址曾採集到一件底部刻「太平戊寅」紀年銘的龜荷紋盤¹⁸。我們從一九八一年於香港舉辦的中國古代窯

¹¹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故宮學術季刊》5卷2期（1987），頁2-3。

¹² 陳信雄，《越窯在澎湖》（台南市：文山書局，1994），頁127。

¹³ 李文信，〈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8冊（1954），頁194圖24之3。

¹⁴ 李文信，同上注，頁201-202。

¹⁵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同注（10），頁53圖32之1。

¹⁶ 金祖明，同注（1），頁115圖6之3。

¹⁷ 紹興市文管會，同注（3），頁44圖4之4。

¹⁸ 馮先銘，同注（7），頁6。

址展當中確實包括一件上林湖窯址採集得到的外底陰刻「太平戊寅」（即太平興國三年），內底心細線陰刻龜荷紋的標本，¹⁹可知越窯細線刻劃花紋飾於北宋初期，即十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出現。換言之，義縣清河門四號墓和遼開泰七年（1018年）陳國公主墓所見繁密的細線劃花越窯青瓷若非傳世品，則應是越窯細線劃花技法和相同的裝飾母題幾乎一成不變地延續了約四十年。可惜帶「太平戊寅」款龜荷紋飾標本只見文字敘述，未刊載圖版，故目前還難就其紋飾特徵和遼墓所出同類作品進行細緻的比較。

另一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初期 Max Loehr 已經為文介紹幾件具細密劃花且帶有太平興國年間紀年銘款的越窯作品，銘款均鐫刻於器底，其包括「太平丁丑」（977年）銘蓋盒（圖一四），以及「太平戊寅」（978年）銘水盂（圖一二）²⁰。此外，就筆者所知，牛津大學亞述摩博物館（Ashmolean）收藏有「太平己卯」（979年）銘碗²¹，上海博物館亦典藏一件「太平戊寅」（978年）銘蓋盒²²（圖一三）。上述幾件作品的刻銘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字體較方，筆劃工整，刻痕也較銳利，其和目前所知來自窯址的可靠標本大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馮先銘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已曾針對前引現藏波士頓美術館的水盂提出質疑。他認為該件水盂底部以泥坨支燒的方式與越窯條狀的支具痕不同，若結合其胎釉特徵，無疑是民國初年的做製品（同圖一二）。筆者贊成這個看法。從流傳於世的大量晚唐至北宋早期的越窯支燒痕看來，幾乎極少例外地均是採用含砂的白細泥，五代時期的支燒白細泥外形細長，北宋時期的支燒泥的寬窄不一，有時呈長團狀，但均環繞器底呈頭尾相接排列；同時細泥含鋁成分較高，可以較易地刮除。反觀上述幾件帶紀年銘款的作品，支燒痕多呈泥團或花生狀，各支燒點不相接續，但間隔有序地分布排列於器底周圍，泥團質地較堅硬，脫落後支燒痕跡有的深入胎骨。此外，若就作品上的細線劃花紋樣看來，如上海所藏蓋盒盒面所示雙鶴紋（同圖一三），其雖亦採行常見於越窯青瓷上的「一整二破」佈局，然而製造者似乎對此構圖不甚熟稔，以致於筆勢既顯猶豫，雙鶴咀頸部位理應營造出的中心圓亦嫌勉強，甚至略去當中一隻鶴鳥的雙足，而這樣的情況是北宋越窯青瓷所未曾見到的。因此，從筆者的主觀認知看來，除了前述上林湖窯址發現的那件帶「太平戊寅」款的龜荷紋盤之外，其餘幾件本文所引用的底刻太平興國干支年款，同時裝飾繁密細線劃花圖紋的作品可能均屬後世做品。然而，這是否就意謂遼開泰七年（1018年）陳國公主墓和約略同時期的義縣清河門四號墓所見細線劃花對蝶紋盤（同圖一〇之1）和龜荷紋盤之製作年代就是在兩墓所埋藏的十一世紀初期？雖然，我們可從北京遼統和十三年（995年）韓佚墓出土的具類似作風之飾細線劃花的

¹⁹ P. Hughes-Stanton and Rose Kerr. *Kiln Sites of Ancient China*.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Hong Kong. 1981. p.13, p.122, fig. 63.

²⁰ Max Loehr, Dated Pieces of Yüeh Ware, *Far Eastern Ceramic Bulletin*, vol. II no.6 1950 p.243. pl. x. fig1-4.

²¹ 筆者實見。

²² 汪慶正等編，《中國·美の名寶》（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91），頁99圖107。

越窯青瓷注子和托盃等作品²³，以及近年報導的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²⁴的同樣刻飾有繁密細線圖紋的越窯作品可以推測得知越窯細線劃花紋存在于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墓葬。其次若結合日本出光美術館一件帶北宋雍熙四年（987年）紀年銘文四繫罐²⁵，罐身浮彫蓮瓣上方之劃花折枝蓮荷筆劃相對疏朗，則越窯青瓷繁密細線刻花的流行年代似乎是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期。

三、 臺灣澎湖群島採集得到的越窯對蝶紋標本

一九九四年，陳信雄先生出版題名為《越窯在澎湖—五代十國大量越窯精品的發現》圖文並茂的專書²⁶。依據該書的記述，採集自澎湖某處遺址的五代吳越國越窯青瓷標本達三千餘件，其中包括有六百餘件器體刻飾各種圖紋的精良作品。由於以往所知採集自澎湖中屯等地的越窯青瓷殘片數量不多，飾有圖樣的標本為數更少，故自陳氏發表以來，即刻引起了學界的注目。然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陳氏的這一重要發現雖是近年臺灣學界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同時也屢次被中國方面學者援引做為越窯陶瓷大量外銷的例證，但直到目前似乎還未有人對此批標本的正確年代進行細緻的考察。

依照陳氏著書所列「澎湖越窯紋飾統計表」可知，六百餘件刻飾紋樣標本之題材內容主要包括：鳥紋（155件）、龜荷紋（96件）、對蝶紋（圖一一）（69件）、龍紋（5件）、纏枝四荷紋（42件）以及蓮瓣紋等植物花卉紋飾；而陳氏的編年依據主要即來自上述標本部份圖紋之可能的相對年代。也就是說，同氏據以定年的資料計有以下三項：（1）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的內底刻劃雙蝶紋，外底露胎處墨書「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等紀年銘文的定窯白瓷盤（同圖八）；（2）越窯上林湖窯址採集得到的刻飾龜荷紋樣，且帶有「太平戊寅」（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年款的標本；（3）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之外底鐫科「太平丁丑」（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同圖一四），器表裝飾繁密細線劃花紋飾的青瓷蓋盒。陳氏認為：既然靜志寺塔基已出現燒造於太平興國二年的劃花雙蝶紋定窯白瓷，那麼越窯青瓷同類母題裝飾之年代就不晚於這一時期，因為前者是受到後者的影響。其次，「太平戊寅」款作品既見龜荷紋飾，「太平丁丑」款蓋盒亦見類似劃花技法裝飾，故包括澎湖標本在內的越窯之繁密細線劃花技法應早在

²³ 北京市文物隊（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365圖5以及頁366圖六之1、6。

²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孫新民〉，〈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3期，頁38圖16。

²⁵ 弓場紀知，〈北宋初期の紀年銘をもつ越州窯青磁をめぐって〉《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1（1995），頁137圖1。

²⁶ 陳信雄，同註（12）。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業已出現或流行。不僅如此，同氏進而結合澎湖所見二百餘件越窯標本器底均鐫刻「丁」字一事，主張「丁」即「丁丑」年之簡易書寫方式。換言之，其於澎湖採集得到的三千餘片越窯青瓷標本的絕對年代是在太平丁丑年（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即吳越忠懿王錢俶進獻其領地降宋的前一年。

另一方面，近年公布的新的考古資料也為我們考察越窯細線劃花紋年代提供重要的線索。新的資料顯示，越窯「太平戊寅」刻款既見於上林湖窯址（Y21、Y43）（同圖五之1、2、3）²⁷，也見於鄰近的古銀錠湖窯址（寺龍口、瓦片灘）（圖五之4）²⁸。尤可注意的是，個別帶「太平戊寅」款的越窯青瓷考古標本，有於器內底內陰刻「對蝶紋」或龜荷紋（圖一之4）²⁹，刻工細密，這就說明了越窯細線刻劃繁密紋飾的年代可早自十世紀七十年代，結合前引墓葬出土例，似可推測所謂對蝶紋或龜荷紋的相對應是在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初期，此一年代觀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海峽打撈上岸（圖一一）或澎湖群島所發現具有類似裝飾作風之越窯青瓷的年代。

雖然，如前所述，傳世的「太平丁丑」款越瓷蓋盒可能是後世偽作（同圖一四），但近來的考古標料卻也表明帶「太平戊寅」款識作品當中確實包括少數刻劃細對蝶紋等細密紋飾的作品（同圖一之4），因此，越窯至遲到太平戊寅年，即西元978年也出現繁密的刻劃花裝飾。其次，由於我們從現今的考古資料看來，並看不出對蝶紋飾有依時代由簡而漸次趨繁的現象，故我較傾向此一紋飾有可能是越窯陶工直接模倣、移植自其他工藝品如金銀器上的紋樣，至於定窯白瓷上的類似母題也可能是直接得自其他工藝品的啓發，未必一定如以往學者所主張般，是受到越窯青瓷的影響。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五代至北宋間越窯系青瓷的銘款，除了窯工姓氏、作坊等銘文或「太平戊寅」干支款之外，另有：大、上、永、天、吉、辛、千、供、子、內、丁、乙、己等。其中「丁」字款於澎湖發現不少，陳信雄認為是「丁丑」之意，即太平丁丑年（太平興國二年），西元977年。但是，此一推測並無任何依據。我們從目前存世的許多「太平戊寅」款標本可知，當時刻劃此一銘款年作品之數量頗大，而太平戊寅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對於北宋政權而言，無疑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同年五月一日錢氏納土降宋，吳越亡。因此「太平戊寅」作品應是北宋之作，而遺留於澎湖的類似標本之年代也應在北宋初，而非報告者所主張的五代十國。

²⁷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65圖31之4；頁67圖32之9；頁67圖32之9；頁72圖35之13（以上上林湖窯區）；頁138圖67之3；頁140圖69之3（以上古銀錠湖窯區）。

²⁸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寺龍口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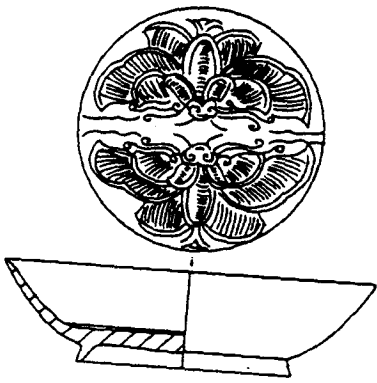
²⁹ 慈溪市博物館編，同註（27），頁140圖69之3以及彩圖15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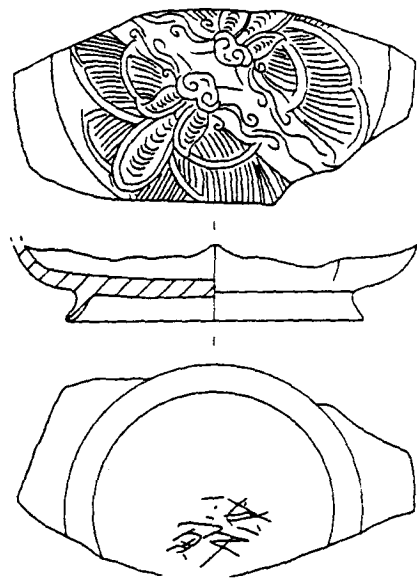
1. 上林湖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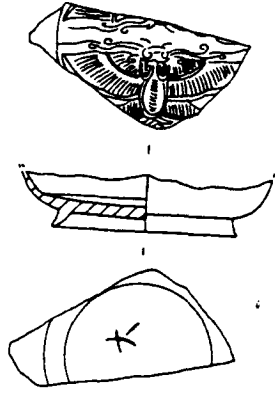
2. 上林湖窯址出土 (Y21)



3. 古銀鏡湖窯址出土
(彭Y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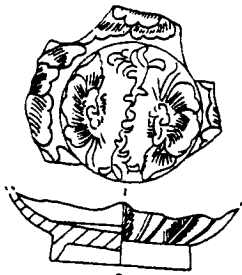
4. 古銀鏡湖窯址出土
(彭Y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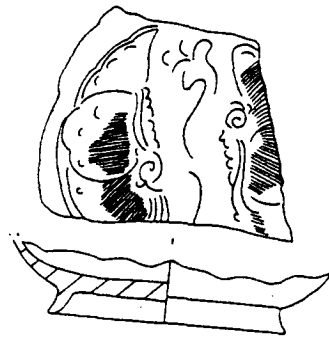
1. 上村湖窯地出土
(Y44=10)



2. 白洋湖窯地出土
(Y5=1)



3. 上村湖窯地出土
(Y65=11)



4. 上村湖窯地出土
(Y43=17)